

李白詩選

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選注

李 白 诗 选

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七 年 · 北 京

李 白 诗 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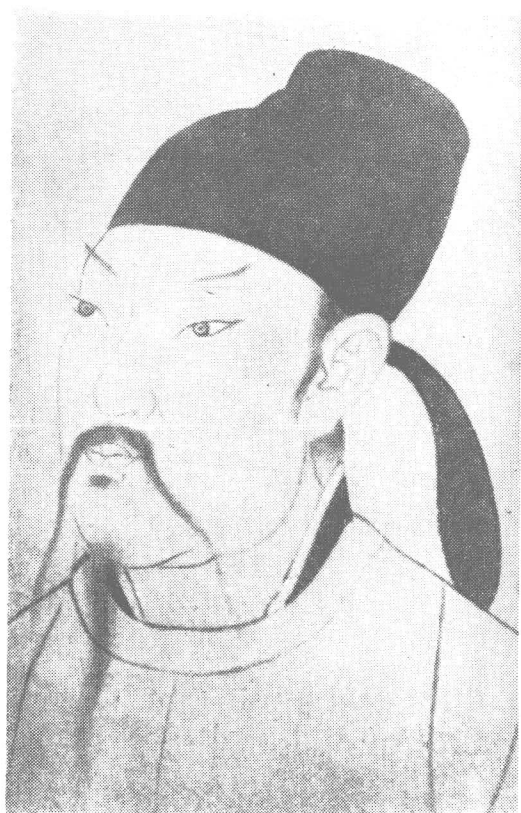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93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10\frac{1}{8}$ 插 页 3

1961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年 11 月 北 京 第 2 版

1977年 11 月 北 京 第 4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 · 1629

定 价 0.72 元



李 白 像

——见故宫南薰殿旧藏《圣贤画册》

李太白文集卷第一

草堂集序

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

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暉九世孫蟬聯
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爲名然自
窮蟬至舜七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
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
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
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
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
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
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

宋本《李太白文集》

—北京圖書館藏

前 言

唐代是我国诗歌繁荣发展的时代，产生了不少杰出的诗人。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，其中伟大诗人李白的成就尤为突出。

李白一生活动主要在唐代中期的玄宗、肃宗时代。这正是唐王朝政治日渐腐败、社会矛盾激化、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，由强盛趋向衰落的转折阶段。李白是这一阶段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，是这个时代的卓越歌手。

李白，字太白，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（公元七〇一年），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（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境，当时属于唐王朝所建置的安西都护府）。李白约五岁时，他家迁居蜀中绵州昌隆县（今四川省江油县）。其父李客，很可能是兼营商业的地主，家境很富裕。李白在诗歌中虽夸耀他的家族，实际并不是拥有特殊社会地位的门阀豪族。李白青少年时期，学习的范围相当广泛。“十岁观百家”（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），“十五观奇书”（《赠张相镐》），并“好剑术”（《与韩荆州书》），接受多方面的思想和知识。在蜀中时，李白还和善谈“纵横术”的赵蕤交

游。赵蕤著有《长短经》，谈王霸之术，主张“三代不同礼，五霸不同法”（《长短经序》），反对“厚古薄今”，对李白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。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白，自幼就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，他常常以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管仲、乐毅、张良、诸葛亮、谢安等自比，自称其抱负是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，即要学习管仲、晏婴一类在政治上有显赫成就的人物，辅佐帝王，使国家强盛，社会安定。同时，李白由于早年就接触并信仰当时很盛行的道教，在蜀中即已喜爱栖隐山林，求仙访道。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，一方面要做超凡的神仙，这样就形成了他贯穿一生的人世与出世的矛盾。

李白解决这一矛盾的口号是“功成身退”，即效法战国时的鲁仲连，首先建功立业，有所作为，然后抛弃爵禄，飘然退隐。建功是前提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。他还明确宣称：“苟无济代心，独善亦何益！”（《赠韦秘书子春》）因此，积极入世是李白思想的主流，指导着他一生的活动，也决定了他诗歌的进步内容。

李白于二十五岁那年，抱着“四方之志”，出蜀远游。在此后十多年内，他先后寓家安陆（在今湖北省）、任城（今山东济宁），并游历了祖国东部的许多地方。他历访名山、道观，同道士们往来。他不愿意象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进身仕途，而是企图通过广泛的结交和诗文投赠，培养声誉，博取统治阶层的重视，给以不平常的擢用。天宝元年（公元七

四二年)，李白果然得到推荐，被玄宗召至长安，供奉翰林。被召之初，李白以为渴望已久的良机来到，非常兴奋地离开了越地的隐居生活。但是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。这时，玄宗已昏聩骄纵，不理政事，他不过把李白看作文学弄臣，为荒淫的生活作点缀。李白不肯摧眉折腰的性格，也同那些权贵们格格不入。因此，不久即蒙受谗言，被迫离开京城。

李白在长安遭受挫折后，心情非常苦闷，在此后十多年内，继续漫游各地，“浪迹天下，以诗酒自适”（刘全白《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》），但对国事仍然非常关心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。天宝十四载（公元七五五年），安史之乱爆发了。这时李白正在江南宣城（在今安徽省）、庐山一带隐居，他怀着消灭叛乱、恢复国家统一和安定的志愿，毅然参加了率师由江陵（在今湖北省）东下的永王李璘幕府。不料李璘不听肃宗命令，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，结果被肃宗派兵消灭。李白也因此获罪，被投入浔阳监狱，不久又受到流放夜郎（今贵州桐梓一带）的处分。幸而中途遇到大赦，才得重获自由。这时他已有五十九岁，一生中的第二次从政活动又以失败而告终。流放回来后，他报国之愿未衰，一度准备参加太尉李光弼的队伍去讨伐史朝义，但在途中忽然得病，未能如愿。肃宗宝应元年（公元七六二年），他没有看到安史叛乱的平定，就因病死于当涂（在今安徽省），年六十二岁。

李白是一位富有政治热情的伟大诗人。他一生的两次重要政治活动，虽然都失败了，但在诗歌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记录，说明他对国家和社会是多么关切。他留存的近千首诗，其

中很大一部分是优秀的，是我们祖国的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，长期来激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。在过去封建社会里，一些文人常常称李白为“诗仙”，把他说成是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人。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，胡说李白“始终是一个出世的道士”（《白话文学史》）。地主阶级、资产阶级文人，都一贯夸大李白诗歌中消极出世的一面，竭力把李白描绘成不关心政治、逃避现实的诗人，这是对李白诗歌进步内容的恶意歪曲，也是对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严重污蔑。

二

李白诗歌的进步内容，突出地表现为他关心国事，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。

天宝年间，唐玄宗贪图享乐，把朝政大权交给宗室李林甫，这个“口蜜腹剑”的权臣，专务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，“朝廷受主恩顾，不由其门，则构成其罪。与之善者，虽厮养下士，尽至荣宠”（《旧唐书·李林甫传》）。李林甫死后，杨国忠以外戚当宰臣，也是非常贪婪腐朽。宦官随从内庭，曲意满足玄宗荒淫生活的需要，因此也深受宠幸，气焰熏天，“鼻息干虹霓，行人皆怵惕”（《古风》第二十四）。奸恶卑劣的人物窃据要津，对不愿追随趋奉他们的人则加以排斥和打击。李白通过在长安供奉翰林的亲身体验，对此深有认识，在《古风》等诗篇中作了充分的揭露。“鸡聚族以争食，凤孤飞而无邻；蚯蚓嘲龙，鱼目混珍；嫫母衣锦，西施负薪”（《鸣皋歌送岑征君》）：这是一种何等黑

暗的局面啊！李林甫还屡兴大狱，诛杀异己，仅天宝六载被杀的知名官僚就有李邕、裴敦复、皇甫惟明、韦坚、李适之等人。李白的诗句“比干谏而死，屈平窜湘源”（《古风》第五十一），正是对这类虐害行为的强烈控诉。

怀抱进步理想的李白，同样受到排斥和打击，“而我竟何辜，远身金殿旁，浮云蔽紫闼，白日难为光”（《古风》第三十七），这是他长安时期遭受挫折的生动写照。在这种局面下，个人要想在政治上获得出路，只有阿谀权势，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。但李白不愿这样做，他傲然宣称：“达亦不足贵，穷亦不足悲。”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）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（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）李白自称“一生傲岸”，但他不是对任何人都傲慢，他最轻蔑的是腐朽反动的权贵，这正是他强烈的反抗精神的表现。

唐朝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朽，孕育着深刻的政治危机。安史之乱以前，李白即已感觉到这种恶果，在诗篇中有所反映。唐玄宗晚年，信任权奸李林甫、杨国忠和藩镇安禄山，大权旁落。安禄山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，手握重兵，野心勃勃，叛乱迫在眉睫。对此，李白借用历史题材向玄宗提出了警告：“君失臣兮龙为鱼，权归臣兮鼠变虎。”（《远别离》）尽管他知道玄宗不会听取他的忠告，“我纵言之将何补？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”，还是不能保持沉默，说明他对国家安危的密切关注。

安史之乱毕竟爆发了。对于叛军分裂国家、虐杀人民的罪行，李白十分愤慨：“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冠纓。”（《古风》

第十九)“白骨成丘山，苍生竟何罪？”(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)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，渴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消灭叛乱，为国效劳。他不但要求收复京城长安，而且决心直捣叛军的老巢：“南风一扫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。”(《永王东巡歌》第十一)“浮云在一决，誓欲清幽燕。”(《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》)这些诗句，表现了他维护国家统一、社会安定而战斗杀敌的决心，也表现了他对前途必然胜利的乐观信念。流放获释后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，面对尚未平息的叛乱，他“中夜四五叹，常为大国忧”(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)。可以看到，诗人一直到死，他的内心仍然燃烧着关心国事的热情。

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对迂腐的儒生和儒学，作出了无情的嘲弄和抨击。唐玄宗大搞崇儒尊孔活动。他追谥孔丘为文宣王，亲注《孝经》颁行天下，立祠庙祭祀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。李白却在不少诗篇中蔑视儒生，宣称自己“羞作济南生(西汉的儒生伏胜)，九十诵古文”(《赠何七判官昌浩》)。《嘲鲁儒》一诗，更以辛辣的语言尽情地嘲笑了孔丘家乡鲁地的儒生们眼光狭隘、行动迂腐、装腔作势的丑态，批判他们思想保守、不知世变，表示自己决不与他们同道。诗中还肯定了秦丞相李斯打击儒生的活动。李白甚至对孔丘也不那么恭敬，他写道：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。”(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)揶揄了孔丘栖栖遑遑，奔走求官的行径。这种对于孔丘和儒学的大胆挑战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，“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，表现为对陈旧的、日渐衰亡的、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”(《路德维希·

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)。但也必须指出，李白批儒嘲孔，大多是由于政治上屡遭挫折后郁愤的倾泄，所谓“儒生不及游侠人，白首下帷复何益”（《行行且游猎》）。而他所相应赞美和追求的，却是超凡脱俗，求仙学道，这就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矛盾和找不到光明出路的消极面。

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无情揭露与高度蔑视，对于儒家和儒学的大胆嘲弄，使李白诗歌洋溢着反传统的叛逆精神。李白是与杜甫并称的唐代大诗人，但封建社会中长期抑李扬杜，主要原因即是由于李白诗歌内容背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。

在李白诗歌中，还有一部分反映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。较突出的有描绘拉纤船夫痛苦生活的《丁都护歌》，有歌颂冶炼工人劳动情景的《秋浦歌》（第十四），有对盛情招待自己的农妇表示感激心情的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。他的《长干行》、《北风行》等诗篇，以凄惋的笔调抒写在封建社会中备受各种压迫的妇女的痛苦，和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所有这些，说明李白在广泛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与下层人民有一定的感情和交往。

李白的一部分诗歌，善于刻划祖国美丽的自然景色。他特别喜爱高山大川这类雄伟壮阔的景象。在他的笔下，无论是“咆哮万里”、“奔流到海”的黄河，“白浪如山”、“涛似喷雪”的长江，抑或是“屏风九叠云锦张”、“迴崖沓嶂凌苍苍”的庐山，“连峰去天不盈尺”、“百步九折萦岩峦”的蜀道，都显得形象雄伟，气势磅礴，不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大自然的

面貌，而且反映出李白自己奔放的情意和开阔的胸襟，以及他追求不平凡事业的渴望，打着诗人思想性格的鲜明烙印。

毋庸置疑，李白诗歌内容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成分。其中比较主要的是描写求仙访道、炼丹服药的道教迷信，以及宣扬人生若梦和及时行乐的腐朽思想。这类封建性糟粕，虽然在李白诗歌中不占主要地位，但它们跟民主性的精华常常混杂在一块。我们在阅读李白作品时，必须仔细地加以鉴别。

三

李白是屈原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，他的诗歌，感情热烈，想象丰富，语言清新，不仅能摆脱格律的束缚，而且能灵活自如地驾驭它，处处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。

李白经常运用夸张的手法、生动的比喻来抒发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。他喜欢用大鹏鸟一飞冲天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抱负，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抔摇直上九万里”（《上李邕》）。他宣称自己具有东晋谢安那样的才干，能够从容地荡平叛乱，安定国家，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”（《永王东巡歌》其二）。在长安时期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，他常常以夸张的笔墨抒写内心的深广忧愤，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（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）。同时着重表现了自己与黑暗现实的尖锐对立，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（《行路

难》其二)。在李白笔下，奔腾的黄河，高峻的蜀道，以及春花秋月，北风雨雪，也都不是客观事物的简单摹拟，而是深深地染上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色彩。这种强烈的抒情性，是李白诗歌的一大特色。他不象杜甫、白居易那样长于细致的客观的描绘，而是经常通过简炼的语言来作直捷爽快的抒发，它们不是迴旋掩抑，而是喷薄而出，奔腾直泻。由于李白思想感情的热烈充沛，而又充满着矛盾，他的一部分诗篇就出现了思想感情迅速起伏转换、跳跃变化的情状，象《行路难》其一、《梁园吟》、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等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特色。

李白的诗歌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、奇幻的神话传说和游仙诗的形式，来表现他热烈的思想感情、他对进步理想的追求以及他同黑暗现实的尖锐矛盾。例如《梁甫吟》诗，诗人刻划自己上天叩关、报国无门的愤懑：“我欲攀龙见明主，雷公砰訇震天鼓，帝旁投壶多玉女。三时大笑开电光，倏烁晦冥起风雨。阊阖九门不可通，以额叩关阍者怒。”在这里，神话中天界的君王、雷公、玉女、风雨等等，都反映了他 在长安时期的遭遇，从而展示了他与封建统治集团的对立，将唐玄宗 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以及他们对他的打击，都表现得异常深刻。《古风》第十九描绘他与神仙结成伙伴，遨游太空，在舒畅的行程中俯视下界，突然发现象豺狼一样残暴的胡兵（安史叛军）蹂躏着洛阳一带，无数人民被屠杀，“流血涂野草”，他的仙梦便破灭了。这又很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起来后他不能再在江南隐居、决心参加斗争行列的心理活动。李白写过不少游仙形

式的诗，其中诚然宣扬了宗教迷信的糟粕，但也常常以此来表现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。

在体裁和格律方面，李白诗歌非常自由解放。在各体诗歌中，他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。七言古诗一般篇幅较长，容量较大，宜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；除七言句外，兼用长短错落的杂言句，形式自由，便于作者纵横驰骋。因此，李白常常用它来表达他那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，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，获得很大的成就。他的绝句，特别是七言绝句，写得清新活泼，自然可爱，在艺术上常常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：乍看起来好象毫不费力，脱口而出，但表现感情异常深刻，使人玩味不尽。李白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明朗自然，摒弃雕琢和辞藻的堆砌。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（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），可说是他诗歌语言的生动写照。李白诗歌的这种自由解放的体裁和语言，是便于表现他豪迈不羁的思想感情的良好形式。

四

李白的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获得卓越的成就，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由于他能够勤奋地向前代文学遗产学习，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的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。

李白的诗歌，与伟大诗人屈原的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对国家安危的关注，对进步理想的坚持和追求，对反动权贵的蔑

视和反抗，对黑暗现实的憎恨，是屈原和李白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共同特色。屈原的辞赋，违背了儒家所鼓吹的所谓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标准，“凭心而言，不遵矩度”（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，对腐朽反动的统治集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，被儒家之徒詈为“露才扬己”（班固《离骚序》）。屈赋在艺术上想象丰富，喜用神话传说来表现炽热的感情和对进步理想的追求，刘勰虽赞叹其“惊采绝艳”，仍不免以为语涉夸诞（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）。其实，这些恰好表现了屈原作品的崭新创造，在文学史上放出异采，开辟了一个新境界。李白的诗歌，大胆地鞭挞了唐玄宗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朽，嘲弄了被视为神圣的孔丘和儒学，在艺术上也是驰骋想象，纵横恣肆，他的创作，同屈原一样，背离了传统的“诗教”，表现出大胆创新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。李白的一些七言歌行，句法长短错落，变化多端，短句仅三字，长句达九字十字，打破七言古体的常规，形成极为雄伟奔放的风格，与屈赋语言风格非常接近，无怪被殷璠誉为“奇之又奇，自骚人以还，鲜有此体调也”（《河岳英灵集》）。李白称颂“屈平词赋悬日月”（《江上吟》），如果不是其创作在思想上、艺术上同屈赋有那么许多契合之处，他对屈原决不会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。

李白喜欢写乐府诗，他的诗歌共二十五卷，其中乐府诗即占四卷之多。乐府民歌形式比较自由，篇幅不限，格律较宽，宜于表现广阔生活，抒发丰富奔放的思想感情。李白一生不倦地向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学习，并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来哺育自己的创作。他集中的许多乐府诗固然深受乐府民歌影

响,即使其他一般诗体,也有不少富于民歌风味。他的《丁都护歌》、《豫章行》等写下层人民的苦难,《白头吟》、《北风行》等写妇女的痛苦,同汉乐府民歌中的一部分优秀篇章风格最为接近。他的《长干行》、《江夏行》、《子夜吴歌》、《荆州歌》等,写女子热烈的爱情和忆念丈夫的愁思,可以明显地看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。然而,这些优秀篇章绝不是乐府民歌的简单模拟,而是反映了李白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,熔铸了诗人自己热烈鲜明的爱憎感情,在艺术上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,在唐代文人乐府诗中别开生面,独树一帜。李白诗歌的不少篇章,语言朴素自然,明朗真率,音节和谐流畅,易记能唱,经常呈现出民歌的那种“慷慨吐清音,明转出天然”(《大子夜歌》)的特色。他善于从民歌中提炼出丰富生动的语言,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入浅出的优点。他的一些绝句,象《越女词》、《巴女词》、《静夜思》、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、《赠汪伦》、《早发白帝城》等,民歌气息尤为浓厚。明代高棅说李白诗歌“语多率然而成者,故乐府歌词咸善”(《唐诗品汇》),中肯地指出了李白善于学习运用民歌自然真率的语言来写作乐府诗,因而获得特出的成就。

对于魏晋以来有成就的诗人,例如曹植、阮籍、左思、谢灵运、鲍照、谢朓等,李白也都注意吸收他们的长处。阮籍对于腐朽的统治集团的讽刺,左思、鲍照对于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抨击和抗议,谢灵运、谢朓对山水风景的刻划,以及曹植、阮籍、左思、鲍照等人所抒发的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和愤懑,都给李白诗歌以明显的影响。在艺术形式上,李白也善于学习吸收